

編 者 的 話

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，都存在着阶级、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，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。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提高阶级觉悟，提高社会主义觉悟，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，并且正确理解和对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。

讲“四史”（革命斗争史、当地和本村变迁史、互助合作史、家庭翻身史），是一种生动而又深刻的阶级教育，是提高我们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的一种好办法。通过这种教育，老一辈的人，重新回忆过去身受剥削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痛苦，就会激起对旧社会、对剥削阶级的仇恨，激起对新社会、对社会主义的热爱。这种教育对于青年人就更加重要。因为青年人没有亲身受过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，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，通过生动的“四史”教育，就能更好地树立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，警惕和憎恨剥削阶级以及它们的影响，把革命事业很好地继承下去。

为了帮助大家从“四史”中接受阶级教育，我们准备从本省的“四史”材料中，选择一部分编成小册子，陆续出版。这本《虎口余生》是其中的一本，大家读后有什么意见，请来信告知，以便今后改进。

1964年1月20日

目 录

- 从一床破棉被看我的前半生.....黄仁盛 (1)
- 大旱喜丰收 莫忘血泪史.....陈文和、吴 晞 (8)
- 一户船民的家史.....唐钦发 (17)
- 吴度日的家史.....王聿青 (28)
- 虎口余生话创业.....杨 涛 (33)
- 馮义江的血泪仇.....阮文梗 (42)
- 抽水机旁话恩仇.....李 行 (48)
- 敌我无亲.....辛 炼 (53)
- 孤儿泪..... (69)

从一床破棉被看我的前半生

黄仁盛

我至今还盖着一床很旧很旧的棉被，这床棉被从被面到被里尽是补钉，棉胎乌黑，已经板结成块，少说也有七八十年历史了。但我舍不得丢掉，还盖着它。为什么？说来话长。

想童年，辛酸泪中泡

小时候听母亲说，这床棉被是我父亲到母亲家上门时带来的，而我父亲又是从祖父手里传下来的。我祖父给地主种了一辈子地，临死就只留下这床被子。我父亲背着这床被子又给人家打了一二十年短工，到头还是一条光棍。三十八岁那年，才背了这床被子到我母亲家来上门。以后，我父亲有了两男一女，家口重了，他砍柴火、烧木炭，日夜卖命，还是三餐难度。由于劳累过度，到我四岁时，我父亲就一病死了。家里老的老幼的幼，生活过不下去，母亲又招了雇农叶友英来上门。

为了给家庭增加一点收入，我十三岁就抱着这床被子到富农黄生奴家做月工。白天上山采茶，晚上还要给茶灶看火，有时看到深更半夜，有时看到天亮，第二天照样要去采茶。这样熬到我十八岁的那年，继父也因劳累过度病死了。母亲流着泪

把我兄弟叫到床前說：“这个家我实在当不下去了，你們还是分开过吧，变龙变虎，就看你們自己了。”分什么呢？我还是卷起父亲留下的这床棉被，背上一口鍋另外过日子去了。

当佃农，受尽剥削苦

日子怎么过呢？只能租田种。有时租楮林寺的庙产，有时租地主的田种。楮林寺和尚嘴里讲“慈悲”，其实跟地主一样狠，山壠瘦田，一年只能收一两百斤谷子，还要拿七成交租。地主更不用說了，因为地比較好一些，一年能收稻、豆、麦三季。收下稻子，一百斤竟要交九十斤的租，剩下的还不够納田粮，所以，一季稻子就算給地主官家白种，自己只能靠收些豆、麦过日子。尽管这样，还不能滿足地主的貪心。有一年，我刚收过豆子，准备种小麦了。地主黃佳玉找上門来，装着一脸苦相說：“仁盛，最近我手头紧啦，你把明年的租先付了吧！”我吓了一跳，忙說：“稻子都沒种，拿什么交租呵！”他板着脸說：“你拿錢嘛！”我的天！那时三餐都顾不上，那



来的錢預交地租。狠心的地主就这样把我的田給抽回去了。原来那时秋收刚过，谷子便宜，他是想拿我的地租錢买谷子，到来年青黄不接谷价上涨时，再卖给穷苦人。这样一轉手，他又可以在地租里多捞一把了。看，地主就是这样穷凶极恶的在穷人身上打算盤啊！所以，我租种着五六亩田，却連一张半的嘴（母亲我負担一半）都顾不周全。一晃过了十几年，家里除了那床旧棉被和一口破鍋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。那年我母亲快死了。她把我叫到床前說：“孩子，媽不行了。你都三十几岁了，也該积攢积攢成个家呵！”母亲死了，我該怎么办呢？

开茶山，落得一場空

那时大湖有几家地主富农兼茶商，他們自己有大片茶山，又雇工制茶卖，生活过得很好。我为寻找生活出路，也决定去开茶山。

在一个飘着雪花的冬天，我卷起了这条被子，上岩上岭去搭了个茅棚，住下来开荒了。茅棚沒有墙壁，四面通風，下雪天晚上冻得直哆嗦；天晴了，湿茅草給太阳一晒，都卷起来，再下一場雨，棚里棚外一个样，躲也沒处躲。一面开荒，一面还要砍柴火卖了换米吃，有时柴火没人要，就得餓肚子。那时我什么苦都咬着牙忍受下来，我想，只要茶山有收，日子就会好过了。

我这样拚老命干了三年，开出了二十多亩茶山。沒錢买茶苗，只好东求西借。因为是借，原来一千株只要八块錢，而我却花了九块。

第五年，茶叶采收了，斤数不多，自己收自己制，搞了四

五十斤茶叶，茶苗錢还没法还清。这时，好心的亲戚就来劝我成家，那时我已三十七岁了。我說还没有錢呢，怎能成家？我那亲戚說：“眼看一两年你那茶山就有大出息了，先借点錢成亲吧！”我心給說活了。亲戚們給我說定了一个貧农妇女，我就向大湖地主徐揚貞借了五十块光洋，加二利息；亲戚們又給我标了一个“会”，借来四十块。当时我这床棉被早已补了再补，不成样了，想做床新的，可是七除八扣，錢又沒了。还好，她从娘家带来了一床盖了十几年的被子，就这样凑合着成了家。

第二年，茶叶果然可以大量采摘了，但問題也来了。头年量少，自己凑合着胡乱制成了；如今茶多，我一沒有制茶場所，二沒有制茶工具，三沒米沒錢雇帮手，不能及时采制，而茶叶到时不采，过一两天老了就一錢不值。这該怎么办？我正急得象热鍋上的螞蚁一般，富农邓土本却找上門来，假心假意地說：“仁盛啊！可不能让茶叶老在山上。我来帮个忙吧！把茶山包給我采制，头春四六分，你拿四成，二三春全部归我。”这叫什么“帮忙”呢？可是，不这样办，別說四成，連一成也拿不回来。“口渴喝盐鹵”，只好点头应允。这时我才知道，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人，要想发家可是难上难啊！

那两年虽然每年都分到两百来斤茶叶，但都不够还債。后来，茶叶也不值錢了，一百斤茶叶还換不到一百斤谷子。邓土本对我說：“你茶山送給我也不要了。”完了！我頂風冒雨、流血流汗干了五年，如今是“竹籃挑水一場空”啊！我气极了，一下子把茶树砍光，插上了杉木苗。我們大湖原来有二千多亩茶山，每年出产水仙茶十万多斤，就在那几年，

茶山全荒了。

忍饥寒，孩子命难活

茶不种了，只好再去租地主的田种，再去忍受那“一九”、“三七”的重租剥削。往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我老婆先后生了五个孩子，到解放时一个也没留下。为什么？孩子没衣服穿，用旧茶袋遮身，吃的是稀米汤，顾得上顿没下顿，饥寒交迫。孩子病了，请不起医生，是死是活随他便，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死了。

有一年，快到年关了，有钱人家忙着杀鸡宰鸭买年货，我们却没米下锅。二十七那天，我冒着严寒上山，想砍两担柴火换点米过年。不料因劳累过度，身体虚弱，砍着砍着，突然一阵头昏，从树上倒栽下来，左手食指摔断，人事不省，好得有人同去，把我抬回家来。我老婆没法子，只好回娘家借来几斤米。大年夜，人家放鞭炮，欢欢喜喜吃年夜饭，我却病在床上，盖着这床破被子喝稀饭。

忆旧恨，翻身不忘本

解放了，穷人的日子总算熬到了头，我分到了十亩土地、四间房子。苦尽甜来，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。有一天，老婆对我说：“日子好过了，人家都在修房子、置家具、做衣服，我们这条棉被破了又补，补了又破，也该换条新的。”我对她说：“你该跟人家比勤俭，不该跟人家比吃穿；这棉被虽然破旧，缝补一下也还盖得，为什么要换呢？”我老婆没话说，就买了几尺蓝布，把破的地方补起来，又继续盖下去。

1955年我担任初级社社长时，心里想，要想开发这个穷山沟，使大家共同富裕起来，开山种茶还是个门路。解放前我个人发家不成，现在推倒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，有党的领导，有集体的力量，还怕什么。我建议集体上楮林山开荒种茶，得到党支部的支持，就带人上山了，克服困难开出三十多亩荒山，种上茶苗。

第二年办高级社，我把当年砍掉茶树种下的杉木林入了社，得到二百元山价款，我拿出一百二十元交给社里作股份基金，八十元存进信用社。这时邻居吴梅婢老婆婆又对我老婆说：“你们有了钱，怎么还盖着那条又旧又破的棉被呀，受苦受了一辈子，也该享享福啦！”这话给我听到了，我就对她说：“解放前东跑西逃，三餐难顾，现在有吃有住又有穿，你说哪样不算享福。”她听了也没话说了。

这一年要为社里管理茶山，我得到党支部的支持，又一个人带着那床旧棉被上楮林山住茅棚去了。当然这一回住茅棚和解放前完全不一样了。这回是为了大家的富裕、子孙的幸福而上山的。即使是数九寒天，身上冷，心里却象一团火，甚么困难也挡不住！

山开出来了，茶树种起来了，山上成立了耕山队，我当队长。茶山愈开愈多，楮林山一天天繁荣起来。前年有一天，社员许永泉来我房间里，看我还盖着那床旧棉被，就说：“你现在当上干部了，又有了名气，还不换条新被子呀！”我说：“老兄弟，当干部更不应忘本，这被子跟着我受过多少苦难，我盖着它，就会更加热爱今天。”

在旧社会我尝尽了辛酸苦辣，只有解放翻身，我才知道甜

是什么滋味。这被子是我的一面镜子，它照见了我的过去和现在。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看到它，我的勇气就来了。1956年上山住茅棚，一次大风雨把茅棚顶掀走了，被子被打得湿淋淋，第二天翻晒时，我又想起解放前住茅棚的时候来，象这种情景还没经历过吗？现在我们是为国家建设出力，为子孙万代谋幸福，能被这些困难吓倒吗？

于是，我这床破棉被就一直留下来了。

（中共南平地委“三史”编辑组整理 苏田插图）

大旱喜丰收 莫忘血泪史

陈文和、吴 晞

1963年，閩南受到了一次自然灾害的严重考驗，漳州城郊公社岱山大队一带，接連有九个月沒有下过一場透雨，旱情极为严重。但是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，人們终于战胜了旱魔，創造了大旱之年大丰收的奇迹。家家户户喜气洋洋，吃到了丰收粮。

正好是二十年前的1943年，閩南也曾連着旱了七个月；可是，在漳州郊外岱山村，全村除了地主、富农因为霸占了水源，收获了二千来斤谷子外，其他农民的土地完全絕收。那时候，地主恶霸趁火打劫，他們用高利貸等手段占去农民的許多土地、房屋，逼得貧苦农民卖儿卖女、家破人亡。凡是经历过那年月的农民，誰的心头不帶着悲憤的創伤啊！回想起来，至今依然对旧社会、对地主阶级充滿着刻骨的仇恨。

在1943年的旱灾中，岱山村有一个青年雇农林亚根，在地主的压榨下，受尽了种种苦难，差一点在旱年中丢掉了性命。

林亚根从小就是“苦竹根子”，三岁时死了父亲，十一岁时又死了母亲；接着就给地主放牛，后来因为受不了虐待，就跑回来在哥哥林連捷身边挨苦日子。到了十八岁的时候，正是

1943年，那年大旱。那时的农村，是封建地主的天下；那时的农民，是被压迫的、个体的农民，他们既受封建地主的高压，又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，力量薄弱，那里有抗拒严重自然灾害的能力。林亚根家有一丘田，原来灌“深泉口”的水，可是“深泉口”被地主吴江圩霸占了。吴江圩派上四个狗腿子，在泉边搭上寮，带上武器，一出水就辱。一连几昼夜，贫苦农民滴水都沾不到。这一季，全大队只有地主富农因霸住水源，插上十二亩秧，收了两千斤谷子，所有农民都一亩无播、颗粒无收。

田播不下，生活也更加困难。大旱年头，地主趁火打劫，高利贷特别凶，一钱金子年利两钱半，借这种债来过日子，就象吃毒酒，可是，喉嚨干不吃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林连捷只好向地



主吳江圩借來一錢金子，兌了四元多銀元，拿着米袋就上漳州城里去了。林亞根一家這時已吃了一個多月刺杏、豬母菜、樹皮，多希望有幾粒米飯進口呀！可是，林連捷到漳州岳口一問，想不到每斗米要三塊銀元，店主還說：“米不多，不快点買，等一會這價錢便買不到了。”林連捷不信，奔到巷口去買，巷口米價跳到六元。他又跑往南門杉巷問，這裡價錢提到八元。林連捷有點懊悔，轉回頭再到岳口問那店主，店主說：“每斗十元！”林連捷氣憤不過，索性拿着空米袋回來了。一進門就倒在床上，長吁短嘆了起來。

米價一天中為什麼會暴漲幾次呢（以後還漲到每斗米十八塊銀元），林連捷在路上聽說，原來從平和、南靖鄰縣來的“頂溪米”，被國民黨的旅長楊逢年、特務頭子陳達元派兵截住（這兩個家伙和奸商控制了全漳州的市場），用三十只大船，把白米運往廈門給日本鬼子（當時廈門淪在日寇手里），一次就運去三千多担，只漏一點點到市場上用高價出售，人們都憤怒地說：“官可資敵，民不得食！”

林連捷沒買得米回來，家里采的野菜也早沒有了，只好燒白水一人喝一碗。林連捷四個孩子號哭整夜；那飢餓的叫聲，叫得屋頂也要掀起來。可村里除了地主富農外，那家屋里沒有噯泣聲呢！

第二天，林連捷拿着錢又出去了，這回買回來一小袋烏黑的番薯干，林連捷悽聲對老婆說：“咱活命根子就這一些了，儉着煮吧！”這一段，全家每個人一頓分得三四片黑番薯干，一大碗白水。可是地主吳江圩却天天從城里帶回來大魚大肉，三頓都是白米飯，他們還故意端到門口吃。那年頭，窮富之間

差得何等悬殊！地主家吃的原是穷人们的血肉啊！村里的穷人们个个都恨透了他们。

田种不下，只好找别的活路。林亚根天一亮，吃上三四片黑番薯干，就上山砍柴去。附近没柴草，得到二十多里远的横山宅去砍，砍不一会，就饿得头晕目眩，支持不下了。有一次，他饿得软坐下来，看见眼前有块红瓦片，久经风吹日晒，质地有些松，他想起“嘴动三分力”这句俗语，也想起有人曾经用观音土充过饥，便随手拣起来，放在嘴里咬，那味道就象过去五月端午节掺酒的雄黄，很涩，吃下喉咙，只觉得重重地往下落。可是，饥不择食呀！以后，林亚根每次外出，一当几小块黑薯干消化净了，熬不住，便用这种风化的瓦片来填肚子。一共吃了一个多月，啃得牙齿也脱掉了。

林亚根砍了柴，挑到漳州去卖，一担柴只值得一角多钱。这一角多钱能买什么东西呢？每回只好买一点红糖。回来后，泡了水，往灶里抓起稻壳灰，搓成团团当粿吃。这味道也是很涩，但因为和了一点糖，总算能咽得下去。

林亚根一个多月吃瓦片和稻壳灰，每顿只有三四片番薯干，结果全身发毒，周身生疥疮，就象“面煎粿”一样，大腿上还生了两颗“牛腿窠”疔。瘫在床上三四个月，连大小便也不能下床。邻居一闻到那股恶臭都不敢走近，只在外边议论：“亚根怕没希望了！”林亚根听了，眼泪直往肚里流，想上吊又爬不起来，只好闭着眼睛等死。

这时候，狠心的地主吴江圩，把林亚根哥哥叫了去，他“老虎挂念珠”，假装好心地说：“你弟弟吃瓦片，病得那么可怜，怎不去请医生呀！”林亚根说：“三顿都‘吊罏’了，

那来的錢去請医生！”吳江圩說：“你不是还有两亩水田、一亩龙眼园嗎？把地卖了，不就有些錢了！”林連捷心里一震：这些地是祖先传下来的家业，是自家的“命根子”，再难熬也不能卖呀！他回答說：“这些地无论如何不能卖！”吳江圩冷笑說：“你不卖可也得卖！”随手拿来一本賬簿，把算盤珠一拨，說：“你借去的金子，母利共四錢，馬上就得还，我等着用！”林連捷說：“这笔債不是到年底才到期嗎？再說，我現在也还不起呀！”吳江圩恶狠狠地說：“还不起也得还！”一根长烟竿，立即朝林連捷的头上摆了过来。結果，那二亩田和一亩龙眼园全都被夺去抵債了，找回的一点錢还买不到一斗米，仍旧沒法請医生。

林亚根的病势越来越重，做哥哥的那能見死不救。一天，林連捷从外面回来，带回来一个人販子，嫂嫂林桃一見問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林亚根說：“把林成抱出来（林成是男孩，当时才两岁）。”林桃已知了八九分，哭着說：“孩子是我的心头肉呀，不能卖！不能卖！”哭了一陣，林連捷劝道：“不是做爸的狠心，池中无水难留魚呀！沒錢买米，反正也得餓死！”那人販說：“这年头，卖儿卖女的多的是，也不光你这一家。”是呀，当时，全岱山村已卖了一百多个孩子（后来統計这一年共卖出一百四十二个孩子）。林桃牙一咬，便把紧抱着的林成放松了。林連捷把林成交給人販子，得了两錢金子。当孩子走后，林桃又呼天搶地嚎啕大哭。林亚根听着，心都要碎成几块了。那时候，两錢金子能頂什么用？还彀不了一斗米啊！林連捷心一橫，又接連卖了八岁的女儿矮花、十四岁的儿子亚仁，一个当年刚出世的女儿，又貼出五升米送給了人家。

还有一个儿子林泉，本来也要卖掉，他的堂叔林发說：“你这样卖得連一条根也不存，那能行！把林泉交給我养吧！”林桃一共有五个儿女，这时都象整窝小鳥似的全給人家掬走了；每交出一个孩子，她总象割肉一样难舍难忍，但是，“絲綫吊不起銅钟”，自己都要餓死了，孩子不卖出去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因为接連卖了好几个孩子，手里有了些錢，林亚根的哥哥便要到城里請医生。誰知道当时請医生是这样的不容易：請一个医生，得先包一元半銀元做“紅包”，以后药錢还不算，医生下乡得坐黃包車，那車費也得由病人家里出。更气人的是：岱山当时交通不便，得走一段山坡路，便沒有一个医生愿意登門，林連捷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了。路上碰到同乡吳典，吳典懂得一点草药，他說：洋医生請不来，我給你出点主意吧！你去采那种象鼻紅、鷄骨紅、黃花，一起煎了給你弟弟吃，这些青草能消毒退火；再去“致和堂”买膏药来敷那“牛腿腕”疔，剩些錢去买点白米煮給你弟弟吃，这样，你弟弟也許能得救。

林連捷照这些話去办了，拖了三四个月的林亚根，果然又从死路上被拉了回来，慢慢地能下床了。后来那腿上的“牛腿腕”疔，留下了两个碗底大的疤痕。

1943年的天灾人禍，比什么瘟疫还厉害，使岱山全变了。林亚根恢复健康后，在村中走动，到处听到的是令人心痛的悲惨事：全村共有一百四十五个人当了乞丐；有一百多个出去当长工，餓死的大人和小孩有二十多个。国民党反动派在这种年头，不顾人們死活，还大抓壮丁，共抓走了三四十个。林九嬰家里只有一个老祖母和一个瞎眼父亲，本来都靠林九嬰这“独

根苗”过活，可这“独根苗”被抓去做壮丁后，他的老祖母和瞎眼父亲，便都餓死了。这一年，地主富农却乘机大发“灾难财”，大放高利貸，大卷地皮。当时岱山五百六十三戶中，就有四百多戶被地主富农卷去地皮一千二百多亩。

林亚根恢复健康后，他哥嫂卖孩子的錢也早花光了。他想哥哥为自己已弄得傾家蕩产，連亲生孩子也沒留下一个，决不能再拖累哥哥了，便出去到龙溪、海澄和南靖等地，給地主和富农当长工，一連五、六年，不知吃了多少苦，到头来依旧两手空空。

家乡解放时，林亚根高高兴兴地回家来，誰知一踏入門，就听見嫂嫂淒厉的哭声。走进哥哥的臥房，只見哥哥肚子胀得象水缸，周身黃肿。一問，原来哥哥在他当长工这一段，有个更慘的遭遇。1948年的一天，他哥哥林連捷从外面砍柴回来，碰到一队国民党匪軍，一个家伙上来，用枪托往他背后一頂，命令說：“跟我走！”这时林連捷已四十多岁了，他說：“我年紀老了，放开我吧，我也不会当兵！”“不能当兵当伙伙！”匪軍怕他跑掉，五花大綁把他綁到南靖县城去。在国民党匪軍里，林連捷受尽折磨：飯煮得不順匪兵的意，这个用皮带抽，那个使脚尖踢，直打得他皮开肉綻。那些当官的，三頓吃的都是大魚大肉，营房里天天花天酒地，可是林連捷和其他士兵，一天只吃两頓，每頓半牙杯飯，配的是黃菜叶。这种非人的生活那能长期熬下去，到了国民党匪軍們潰敗时的一个黑夜，林連捷便拼死跑了出来，匪兵一发覺就在后面紧紧追捕，他跑到一条溪边，叫不到渡船，心一狠，往水里就跳。国民党匪兵追到这里，便开枪射击，因为黑夜，林連捷沒被打死，可是不会泅

水，好容易掙扎上岸，已是奄奄一息了。

林亞根在床頭和哥哥說：“哥哥，解放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，我們窮苦人出頭的日子也來了！”

林連捷含淚說：“好日子我過不到了，人不行了！”他艱難地喘着氣，又在牙縫里擠出幾句話：“亞根，要記住呀！我們一家是被誰逼得家破人亡的！”說着，便閉上了眼。

解放了，岱山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過去受盡苦楚的林亞根，也起來當家作主了，他參加了民兵，當了人民代表。土改那陣，他更無日無夜地參加火熱的鬥爭。而過去殺過人、占房奪地、作惡多端的地主吳江圩終於畏罪自殺了。

過去離散的骨肉，解放後大都團聚了。給堂叔帶去養的林泉，解放後就回到自己的家，現在是團支部書記、生產隊副隊長；林亞仁回家後，參過軍，復員後曾到龍溪機器廠當工人，現在下放回鄉支援農業。林矮花被一個老上中農買去後，受盡虐待，土改時也回來了，到1959年才出嫁。只有林成因為二歲時賣出，接着買主又遷居，所以現在仍不知去向。林亞根也結了婚，至今已有了三個兒女。嫂嫂這一頭，在身邊有兩個兒子，兩個兒媳，三個孫子。大家都喜氣洋洋。解放以來，林亞根當過初級農業社社長、高級農業社副社長、人民公社大隊長。1960年，當了岱山的黨支部書記。他在这漫長的歲月中，深刻体会到：只有堅決跟着黨，堅持革命到底，才能使勞動人民徹底得到解放。現在在他家的門額上，貼着“愛黨愛國”這幾個字，在門聯上，寫着“聽毛主席的話，走共產黨的路”。這些紅門聯正反映了他那顆永遠鮮紅的革命忠心。

1963年的旱情，虽然比1943年更厉害，可是如今不同了，地主阶级早已打倒，小农经济改造成集体经济了，而且有了三面红旗，有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与支持，人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，有了集体力量，就不怕天灾作祟了。他们开了一条一公里多长的渠道，接通九龙江北溪内林水利，设了九台抽水机，共建五个站，一级一级把江水抽上山坡，70%的耕地做到自流灌溉；其他又积极打井、挑水，终于插上六百七十二亩秧，比原计划还多插12%，夏收时，每亩收谷六百斤，共收四十万斤以上。要比1943年的两千斤，那就增加两百倍了。人们说：要没党的领导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，那能见到早年的丰收米！……

过去早年啃瓦片，如今早年照常吃上白米饭。对比起来，林亚根有着怎样的一种心情啊！因此，他便把自己的这些家史告诉给儿子金龙，还叫金龙执笔把这家史一段段的记下来，免得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忘了本。他还教育孩子要刻苦学习，将来好把革命的重担挑起来，彻底挖掉剥削阶级的老根，把我们的社会建设得更加美好。

（完 无插图）

一戶船民的家史

唐欽發

我們船民是在水上生活的。一條破小船就是我們的家，一家數口，全擠在裡面，在舊社會，可真是伸不得腰，抬不了頭啊。

我家原在烏龍江一帶捕魚為業，這烏龍江是公眾的地方，可是，漁霸們偏偏說江是他們的，硬要收我們的“江面錢”、“靠泊費”、“看河費”，還規定，凡是在烏龍江捕到的魚，都得全部賣給他們。說是買，其實是搶。漁霸的“漁商筏”在江上穿來穿去，只要我們一拉網，“漁商筏”就象箭一樣飛到面前，壓一半秤，殺一半價，一眨眼工夫，整網的魚就是他們的了。

漁霸中有個林本土，這人又矮又胖，滿臉橫肉。他坐鎮在尚千碼頭。買魚時，他說多少錢就是多少，誰敢不依，那可不得了。有一次，林金鏘捕到一些魚，林本土硬要十個銅板一斤向他買，金鏘不答應，提着魚到岸上叫賣。林本土就叫一個狗腿子跟在金鏘背後，金鏘走到哪里，他跟到哪里，要買魚的人見到林本土的狗腿子跟着，也都不敢買了。到了晌午，魚要發臭了，急得金鏘沒有辦法，只好對那個狗腿子說：“好吧，就十個銅板一斤賣給你。”誰曉得，那個家伙上去先“啪！啪！”

地打了金鏘两个巴掌，然后骂道：“你这个曲蹄仔真贱，刚才十个铜板不卖，现在倒卖了，害得老子腿都跟酸了。”顺手抢过鱼桶，朝地下一摔，桶给砸烂了，满地的鱼也踩成泥酱。

我们在尚干江面捕鱼，就得卖给尚干的渔霸，有时马尾的渔霸也要买，我们不敢卖，就被痛打一頓，鱼，硬被买走了。尚干的渔霸知道了，又是一頓毒打。有时，他们碰头了，就在我们船上打起来，结果，我们的网被扯破了，船被打漏了，鱼也被抢得精光。渔霸们你争我夺，互相勾心斗角，受灾受难的却是我们船下人！

渔霸的右腿刚跨出船外，地痞流氓们的左腿又伸进来了。他们拿不到鱼，就拿我们的东西，见钱拿钱，见衣服拿衣服，我们想了个办法，把辛辛苦苦积下的一些钱，藏在竹筒里，用绳子系住，沉在水中，船到哪里，拖到那里。就是这样，我们还是时刻提心吊胆，总怕被他们发现。有时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绳子断了，整筒的钱就失掉了。遇到这种事，一家人又是捶胸顿足地哭得死去活来。

人人都说，“平原好跑马，江阔好撑船。”可是，乌龙江再阔，也没有我们船下人插一根竹篙的地方！

江上实在住不下去了，我们就想往岸上搬。每天望着岸上一片片的稻田，一排排的树林，一缕缕的炊烟，心里有多么羡慕啊！都想上岸去种些田，农闲时再捕些鱼，也许，日子会好过一些。

我爷和我爹在乌龙江边石步乡附近找到了一块荒地，这地里长满了芦苇，大水一涨，就淹得白茫茫一片。因为经常淹



水，沒人愿意承租，地主林白蔗正苦于没法脱手，我爷求上门去，也就做个顺水人情，答应卖给我们。爷又给石步乡的地主王怡煊送了财礼，他收下了礼物，又听说林白蔗都答应卖地了，也就同意我们住下。

答应是答应了，不过，他也跟乌龙江的渔霸一样，给我们立下了一大堆的规矩。他说：“乡里有事，随传随到，壮丁钱粮，公益募捐，照样分摊。至于你们要盖房子，那就更应该按老规矩，一不能打地基，二不能用砖瓦，三只能盖船形的。”

规矩，规矩，江上有江上规矩，岸上有岸上规矩，什么规矩，还不是一把把刀子往我们船下人的头上插！

俗语说：“在人屋檐下，怎敢不低头”。爷爷只好忍气吞声地随便搭了一间遮风避雨的竹楼，我家总算是定居下来了。

为了租种土地，爷爷又是整天东奔西跑，到处求情，不知磨破了多少嘴唇，后来，还是通过二地主才转租到尚干地主林

白蔗和敖峰地主敖里金的十一亩祭田，每亩租金四担谷子，二地主还要从中剥削。我们一家人都知道，这是雨中挑稻草——越挑越重，这真是嘴渴喝盐卤啊！

我家住下不久，有几户船下人也陆续搬上岸，都搭了竹楼，以后就成了“竹楼村”。

上岸时，我家有七口人，爷爷、奶奶、爹、妈、哥、我，还有一个从小抱来的我的童养媳菊花。

为了养家糊口，我家除了种地外，还替林白蔗看管两百多株桔树。我爷我爹真是拼死拼活地干，连中午都难得歇息。晚上，还得住在桔园里，看守桔子，稍有响动，就得起床察看，有时一夜没合眼。树上的桔子越长越红，而爷爷和我爹的脸色，却越变越蜡黄，在我七岁的时候，爹终于累死在桔园的草棚里。一年之后，爷爷和奶奶也相继死去。

后来，尚干一个农民翁火耿流落到竹楼，成了我的后爹。

八岁，我就和哥哥唐欽鹏一起帮人看牛，十二岁就下田种地，干重活。可我家的苦难，还是越来越重了。

当初，石步乡地主王怡煊答应我们住下，是有他的鬼算盘的。他原想以一亩五担的租金把地强租给我们，替他当牛当马。没想到我们却向尚干和敖峰的地主租了祭田，从此他就怀恨在心，更是冷眼相待，公开地支持石步乡王码头的一批地霸、流氓来欺侮我们。

这些地霸流氓，自称为“四霸天”，坐第一把交椅的是王家官，他还在乡里开设“拳头馆”，手下养有一群打手，平日里横行霸道，鱼肉乡里，对于我们船下人本来就是百般凌辱，

如今又有地主王怡煊撑腰，更是一手遮天，为所欲为。

王碼頭离竹樓村只有二三里路，中間隔一片稻田。地霸流氓們几乎每天都来两三趟，来一次，就象村子里害一場瘟疫一样。他們什么坏事都做尽了。

一九三四年秋天，稻子黄澄澄的一片，好不惹人欢喜，真是难得的好年成。爹的心情也好了一些，有一天晚上，他拉着我的手說：“欽发，收了稻子，爹給你做条褲子。”我搖着头說：“我不要，只要能让我飽飽地吃一頓就行了。”說得爹媽都笑了。我們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忙着补籬篋，修軟卷，还特意买回了几把新鑲刀。哪知道，就在收刈前几天，一場横禍突然飞来。

这一天清早，竹棚的門“蓬”的一声被踢开了，“四霸天”手下的一个打手闖了进来，他手提竹篙，歪戴草帽，敞着上衣。一进门就把竹篙扔給我，喝道：“去，替我看鴨。”回头又对我爹說：“中午在你家吃飯，把那只大鴨杀了下酒。”然后，就躺在床上，神气地迭着双腿，悠閑地抽着烟。我心里一万个不愿意，可是又不能不去。

当我走到田里一看，天哪，我家一大片的稻子已經被压倒在地上，几百头鴨子在上面乱踩乱窜，乱吃乱搶，有一个流氓还拿着竹篙横扫直蕩地把稻子继续压下去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我大喝一声，不知哪来的胆量，一个箭步搶上去，夺下他手里的竹篙，气得渾身发抖。这流氓被我的气势吓退了几步，口里虽然罵着，却也不敢挪动一步，就怕我用竹篙劈他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打手象野狗一样从我家里闖出来，气汹汹地夺过我的竹篙，往我身上捅了几下，破口大罵：“×你

娘，你这××仔，鴨子就是吃了你家的稻子，你敢怎样！”說着，又提起竹篙在稻田里揮舞一陣，顆顆飽滿的谷粒，紛紛落到田里。

我爹我媽聞声都赶出来，爹當場就吓呆了，象一根木桩子一样，站在田头，动也不动。媽嚎啕着从地上滾过去，死命地抓住那个打手手里的竹篙，跪在他面前，苦苦哀求：“做做好事，做做好事，……”

求有什么用呢？无端作恶的豺狼，没人性的豺狼啊。

这一天，几百头鴨子在我家的田里吃了一个上午，整丘田的稻子都被糟蹋了，而我还得替他們看着鴨子。每当鴨子吃一口，我就淌一滴眼泪。我真想把这些鴨子全都打死，可是，我又想，要打死的不是鴨子，应该是那些专门残害我們的人！这时，大概他們还大模大样地在我家里喝着酒，吃着鵝肉，我那可怜的爹媽，一定还躲在屋角抱头痛哭。

唉，旧社会里的船下人，就是人家案板上的肉，四两半斤随人刈！

这一年冬天，我不但没有穿到新褲子，也没有飽吃一頓，我家反而欠下了几担租子。

第二年春天，眼看就要插秧了，我家的晚稻秧，又被王家官帶着一伙人全部拔走了。从此，我家再也听不到笑声了，爹整天愁眉苦脸，人变得迟鈍多了，精神恍惚，两眼失神。只要听说王碼頭的人来了，就吓得躲起来，不敢吱声。

躲是躲不了的，就算躲得了人，也躲不过他們的“簡书”。什么叫做“簡书”呢？其实就是乡里向我們派錢派差事的通知书。只要王怡煊那些地主、恶霸們高兴，或者是又想出一个

欺侮我們的鬼花樣，就在白紙上隨便塗上幾字，馬上叫人送來。派我們十塊錢，就不能交九塊九，甚至連他們死了人，叫我們抬棺材，也下“簡書”。送“簡書”的又都是那些鴉片鬼、賭博鬼，送一次“簡書”，就要我們一次“草鞋費”，所以他們也樂得多送幾次。記得一九三七年春節，為了鄉里演戲派“戲薪”的事情，一天就給我家下三次“簡書”，叫我到鄉里去。我遲去了一些，就被王怡煊下令捆起來，最後媽趕去了，答應加倍出“戲薪”，才把我放回來。

敖峰的地主敖里金來了，每次都要竹樓村的姑娘給他揸背，鞋子上稍為沾了一點泥巴，就翹起腿叫她們擦。尚干的地主林白蔗來了，每次都得派一個人專門替他裝煙點火，因為他有一根兩尺多長的煙管，隨時帶在身邊，據說，這樣才能表明他是最有“身份”的人。又因為他是東家，每次都得加倍款待。就是他，把我爹逼得終於發瘋了。

一九四〇年秋天，林白蔗叫我們和車弟兩家把今年的租子全部交給地主王依喜，並且當面寫了契約。秋收後，我家湊足五十担谷子挑給依喜，車弟也如數交了租。誰知道，到了年卅晚上，林白蔗又派了狗腿來我家要地租，媽趕緊拿出契約給狗腿看，他理都不理。天哪，再叫我們拿出五十担，這不是逼着我們全家只好上吊嗎？不管我們怎樣懇求，狗腿一定要我爹和我到尚干去一趟。

這一天晚上，爹和我終於被帶到尚干去了。林白蔗見也不見我們，就把我們父子倆關進房間。外面鞭炮一陣陣地響，家家戶戶都在過年，大廳里傳來林白蔗的狂笑聲，爹和我卻又冷又餓，爹低頭一聲呻吟，抬頭一聲嘆息，苦淚象斷線的珠子似

的落个不停。我們都想念在家里的人，我想这时媽和哥哥不知哭成个什么样，他們一定耐着寒夜，守在竹棚里，等着我們回去过年。虽說我們沒魚沒肉，可是一家人团聚一起，也就是大欢大喜了。現在……。到了夜里一点钟，大概是林白蔗把我們折磨得够了，才把爹和我放回去。

深夜，我和爹划着小船回家。肚子餓得直打嗝，陣陣寒風，吹得我們渾身发紫，周围的山头，面前的江水，黑幽幽地一片，夜鳥不时发出凄厉的叫声，爹怕得直往我身上靠。滿口說着糊涂話，我真就心他会突然跳进江里。回家以后爹就发疯了。

其实，这次林白蔗并不是真正为了五十担的租子抓我們，而是故意在年卅晚上作弄我們，摆摆威風，可怜我的爹，就在这样作弄下，发疯了。

我二十一岁那年，被抽上壮丁。保长敲走了一笔錢之后，答应給我緩期，可是，不出五天，又来抓我。逼得我沒有办法，只好在一个夜晚，偷偷地离开了家，到外面流浪。

在外头，我整整流浪了七八年。大部分時間是替馬尾地主林洪金弟看鴨子。整天吃不飽，穿不暖，風里去，雨里来，沒半刻安閑。有一次涨大水，也逼着我去放鴨，我翻船落水，险些被淹死。有几次我实在受不了他的气，頂了几句，不是被打，就是扣了工錢。我真想不干回家，可是，有家也回不得啊！

有一天晚上，我躺在鴨楼的床上，想起了我死去的爹，想起了王怡煊、“四霸天”对我家的种种压迫，想起发疯的后爹，又想起了自己如今单身孤影地流落外头，有家不能归，我

問自己，这苦日子何年何月才能到头啊？我家的苦根子究竟是什么啊？当时我还不知道苦根子是国民党反动派，是万恶的旧社会，但是我却十分明白，只要那些地主、恶霸沒有打倒，这苦日子是永远不会到头的。怎么打倒呢？我又知道了。

我想啊想，想不出办法来。刚好，这时野猫跑进来啣鴨子，一头鴨子被咬得呷呷地叫，我提了棒子赶出去，野猫被赶跑了。这时，我突然想起，鴨子被咬，也会呷呷地叫喚，难道一个人却能这样无声无息地让人家要杀就杀，要宰就宰嗎？

不久，我偷偷地回了家。这时，正是日本鬼子第二次占領福州时期。

我刚跨进小竹棚，就大吃一惊，家里缸破鍋碎，一眼看过去，沒一件东西是完整的。我媽哭着对我說：“真沒天理啊，”原来，前天晚上一批穿着軍装，佩着长刀，打着官腔的日本仔来到竹楼村，当时大家都以为是眞的日本鬼子，都避开了。这群鬼子把各家各戶都洗劫一空。回去时有一个躲在稻田里的妇女，听見这些日本鬼子在回去的路上忽然說起福州話来，再一听，又听出是王碼頭那一批地霸流氓們的声音。这些无賴恶棍，竟狐假狼威，佯装日本鬼子来欺压我們！那个妇女回来一說，大家气得直咬牙。

我当时听了，更是气得怒火冲天，于是就跑去跟乡亲们商量，我說：“不能让他们再这样欺侮下去了，要是下一次他们再来，就跟他们打。”后来，我們还商量了一个对付的办法。

过了几天，也是晚上，那些假日本又来了。乡亲们分头准备，拿棍的拿棍，拿扁担的拿扁担，暗地埋伏起来。那

些假日本以为上次搶得順当，这次更是大搖大摆地走来，毫不提防。当他們刚走到村里，只听得一声：“打啊！”乡亲们都是从暗处冲出来，拿着扁担、木棒朝着假日本劈头盖脑地打下去。多少年来被压迫被残踏的怒恨，这时全部发泄出来，誰都想亲手狠狠地打他們一頓。

地霸流氓們做梦也没想到我們会給他們这样厉害的反击，个个吓破了胆，掉头就往村外跑。这时，埋伏在屋頂上的妇女，抓起早就准备好的砖头、瓦片拼命往他們身上扔，打得他們屁滾尿流地逃出了竹楼村。

乡亲们可高兴哩！家家户户都充滿着笑声，都感到，这一次才真正地出了一口气。

后来，我們又跟王碼头的地霸流氓們好几次打起架来。其中最大的一次，是1945年夏季。当时他們糾集了二十多个人到我們田里硬要收巡洋谷，在田里干活的妇女們不讓收，双方就打起来了。这一次我們竹楼村妇女受伤了十多人，我媽和我妻子菊花都被打得受了重伤。这次我們也不讓他們白打，托人写了狀告到伪法院。其实，国民党就是地主、恶霸們的后台老板，他們所以敢这样横行霸道，还不是因为有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保护。可是当时我們不懂得这个道理，却跑去告狀。当然，最后是象石沉大海一样无声无息，得不到結果。不过打一打，他們也收敛一点，不敢收我們的巡洋谷了。

通过这几次斗争，那些地霸流氓們是不敢象过去那样任意地欺侮我們，但是我們还是处处受剝削受压迫。人們还是叫我們“曲蹄仔”，上岸还是不能穿鞋子，盖房子还是只能盖船形的，地主、恶霸、流氓們还是騎在我們头上，总的一句話，我們还是

受践踏。我心中常常想：“什么时候，我們才能抬起头来呢？”

1949年8月17日，竹楼村解放了。

共产党来了，我們船下人才真正得到做人的权利，我們才第一次穿着鞋子，抬起头，在大路上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，再也沒有人叫我們“曲蹄仔”了，再也沒有人随便欺侮我們了。1950年我当了乡里的民兵副队长，我哥当了农会主席，我和全村受苦的乡亲们一起斗倒了王怡煊，斗倒了“四霸天”，同样分得了土地。1952年9月，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合作化运动以来，我一直担任互助组长，高級社长。我們竹楼村的乡亲们，都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。1957年，省委叶书记和陈紹寬副省长，还亲自到我們社里来，問寒問暖，給我們指出集体化的方向。1958年，我們全村都加入城門人民公社。

解放十四年来，集体化的道路真是越走越寬闊，我們的生活也年年提高。如今“竹楼村”的竹楼早就不見了，到处都盖起新房子，而且座座是油漆得花花綠綠的木房子，又寬敞又清潔。我們住的地方再也不是“上不頂天，下不着地”了，可以随便地抬头伸腰了。过去我們村里連个識字的人也沒有，如今不讲小学生很多，而且也有中学生了。解放后我們从最低层翻身当了主人。这些都是共产党、毛主席带来，也是公社带来的好处。共产党就是我們的亲娘，公社就是我們的家。

有了好日子，可不能忘了过去的苦日子。每想起过去的痛苦，我就更热爱党，热爱毛主席，决心永远听党的話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！

（刘一承整理 黄成賢插图）

吳度日的家史

王聿青

泉州城东公社东星大队玉田村貧农社員吳度日之所以叫做“度日”，是和他的家庭的悲慘遭遇紧紧联結在一起的。吳度日未出世前，他家里已有四个人：父亲吳兴全，母亲江銀，姐姐吳烏恨，哥哥吳栋。本来，他家里也有两亩薄地，一家人勤俭过日子，也还可以糊口。可是，在旧社会，玉田这个村是小姓小村，村小人少，受人欺侮、压迫就更厉害。度日的父亲为了避免抽壮丁，每年要出四次至五次壮丁費，一次都要花十多担谷子。就这样，保长还是不肯罢休，还是想要抓人。因此，不上两年，度日家就更穷了。吃的是照得見面的麦糊和番薯渣糊；穿的就更不用談了。及至度日出生那年，几乎連番薯渣糊都吃不上了。度日出生的那一夜晚，母亲連一碗填腹的稀麦湯也沒有。当时，父亲看到又生下一个孩子，不断摇头，說：“在这度日如年的日子里，你又生在我这穷苦人家，日子要怎么度过呀！”母亲說：“再怎样也該給孩子起个名字。”父亲說：“就叫度日吧！”吳度日的名字，就这样命上了。

吳度日和他的一家，在人間所难以想象的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掙扎着。家里的两亩田地，卖掉去还壮丁錢了。租来的房子，

人家也不給住了。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一家五口人，怎么过活呢？度日的父亲吳兴全，只能凭着一双空拳，和飢餓搏斗。他到处流浪，卖苦力，想賺些錢来撫育妻儿，但是旧社会难找活路，度日的父亲外出做工連他飯都吃不飽，那里还有錢拿回来养家活口！度日的母亲和哥哥姐姐，就只能拾馬齿莧和番薯青来充饥。

就是这样，苦日子也并不平靜。在度日六岁那年，有一天，度日父亲去給人抬石头造桥，因飢餓无力，走到桥上，头一昏，双脚一軟，跌到桥下，大石把他的腿砸断了。东家不管他，母亲和哥哥只得把他抬到破庙里躺着。父亲的两条腿不中用了。借以維持生命而奔跑的两条腿啊！这对于苦难的吳度日的一家，将意味着什么呢？冷酷的旧社会又有誰来过問伤病者的治疗和他的一家生活呢？不多久，吳度日的父亲就在伤痛和飢餓中被折磨死了。

父亲死后，家里更加困苦了。这地方穷人多，連野菜也沒处拣。不久，哥哥吳栋，也这样餓死了。母亲抱着哥哥的尸体，哭得死去活来。眼前还有一男一女，悲痛欲絕的母亲也只好掩埋了吳栋，带了十岁的女儿烏恨，和六岁的儿子度日，到惠安去行乞。但是，旧社会要飯也不容易，要来的飯不够三个人吃，顾了度日，顾不了烏恨；顾了烏恨，顾不了度日。懂事的烏恨看到弟弟年小、母亲年老；又看到眼前有的只是一羹半碗残飯，她不忍吃，留下給弟弟和母亲吃，自己餓得头昏目眩，也不愿叫一声餓。五十多天以后，这个清秀坚强的女孩子，与哥哥一样也活活地餓死了。沒有飯吃总不能活命啊！度日的母亲想出卖劳力，給人家当佣工，那怕是有吃无工錢也好。問了

不知多少家，有錢人見到她那瘦骨嶙峋的樣子，就說這樣的人會吃飯不會干活，都不要她。度日母子倆，就象貨物似的讓人挑揀，這裡挑那裡選，最後惠安縣城的一家又是富農、又是資本家的人家，才挑中了度日這個九歲的孩子，讓他在家里打雜。當面言明，不能留他母親。度日母親想要挽救孩子的一條命，忍痛將日夜伴隨在



身邊的唯一的兒子送進富農家去受苦了；自己仍然拄着木杖，提着飯籃去度那行乞的日子。想念孩子時，就偷偷跑到這家門口看一看。

那是寒冬的一個夜晚，這個飢餓的母親，臉都腫得發脹了，她想念孩子想得厲害，又偷偷來看一次，然後含着淚回到作為棲身之处的破廟里。誰知，人餓虎更餓，半夜裡一只老虎把她咬走了，廟里只剩下被撕裂的破衣片和幾滴血，別的什麼也沒有了。第二天，幼小的吳度日聽說母親被老虎咬去了，跑到廟里又哭又喊，但是，天是那麼高，地是那麼厚，只有蒼茫的白雲沉重地在行走，有誰來同情他，有誰來安慰他呢？

狠心的东家认为今后更可以任意摆布这个孤儿了，从他母亲死后，竟要不到十岁的度日干大人的活了！这还不算，有一次东家自己的孩子偷番薯，诬說度日偷了，度日有口难分辯，这个东家就要把度日抓去活埋。度日知道后，連夜偷偷逃出，躲在草堆里，两三天沒吃。幸好这时有个好心的农民，把他救了，送他回玉田村。玉田村，他这里已沒有家，那一块地是他的，那一片地能让他立足；在旧社会，他还是只能到处流浪給人家看牛、当长工，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。一个正在发育成长的孩子，被折磨得簡直是一层皮包着几根凸起的骨头。

正当度日奄奄一息的时候，泉州解放了，这个蓬头垢面的流浪儿，重返了家乡，分了田地，分了衣褲。但是，被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孩子，連走路都是鈎着头、拖着腿，他那里能耕田呢；于是，村里的互助組、初級社，把他的土地代耕了，而且把他送到医院去进行治疗，人民政府还經常发給他救济款。在新社会，这个被残害的孩子，获得了新生，到高級社时，他已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了。

吳度日在社里，劳动好，工作积极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，而且还当上了团支部書記。1958年公社化后，度日被調到公社农具厂当工人。这年，吳度日响应祖国的号召，得到了組織上的批准，参加了人民解放軍，拿起武器保卫社会主义建設。在部队里他和許多战士一样，日日夜夜守卫在海防前綫，成了一个保卫祖国的优秀战士。不久前，吳度日轉了业，他被安排在泉州鉄器社当工人。生产队副队长庄淑琴看到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，如今已成长为一个健壮的彪形大汉，便对吳度日說：

“你現在可以成家立业啦！”度日含羞說：“我这笨头笨脑

的，誰愿意……。”庄淑琴說：“我給你当介紹人，我妹妹淑团，她一向工作积极，劳动好，你是知道的，你合意不？她对你早就有意思了呢。”吳度日点点头羞得跑掉了。

前不久，吳度日和淑团結婚了。結婚时，他买了新的櫥、桌、眠床，新的罗帐，新的棉被，又添置一些衣服，还建了两間房屋。吳度日在泉州鉄器社做工，庄淑团在家里劳动，两口子日子过得十分美滿幸福。有的社員說：“吳度日，你的名字可以改改了。”度日說：“我这名字要留下来，一方面使自己永远不要忘记过去度日如年的苦日子；另外，也让下一輩知道我在旧社会是怎样度过来的。”

(苏 田插图)

虎口余生話創業

楊 濤

在尤溪梅仙公社楊梅坪的高山上，我訪問了一位名叫蕭祥鎬的老人。他今年六十岁，从二十九岁起，双脚就瘫痪了。在那吃人的旧社会，劳动人民两腿残废就意味着死亡。但他不甘心死，他要斗争。在地主、高利贷商人的残酷逼迫下，他咬牙忍受疾病的折磨，爬着滚着上山开荒，种植了许多油茶、油桐、杉木和粮食作物。一年、两年，粮食收成了；五年、十年，林木长成了，萧祥鎬的境遇又是怎么样呢？他逃得了高租，也逃不掉重利；逃出了地主的血手，又掉进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。十多年血泪创业，到头来只留下一身债。解放以后，他翻了身，农业集体化以后，他一家的日子好过了，可是，萧祥鎬老人并不满足于这些，他的眼光看得更远，他依然用凳子代腿，带领着子女和社员们一道翻山越岭，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发愤劳动，谁也劝阻不住他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志啊？这种意志是怎样产生的？说起这，话就长了……

屋漏偏遭连夜雨

1932年，当萧祥鎬二十九岁的时候，他父亲病死了，母亲



已經五十多歲，老婆是個小腳女人，大兒子六歲，小兒子才周歲，全家老少的生活重擔落在他的肩膀上。當時，他家租種梅營鄉地主詹鵬廷十來畝水田，每年還得要交二十三担租谷，只靠他一人沒日沒夜的操勞。不多久便累出了重病，因為無錢請醫生治療，結果兩條腿都癱瘓了，只能躺在床上，連坐起來都不可能。

蕭祥鎬一躺倒，家裏的生活怎麼辦呢？他打算先請一、二個親戚朋友幫忙把地種上。可是，正在這時，地主詹鵬廷的弟弟詹鵬光來到他家里，氣勢汹汹地說：“我的地你明年不能耕了！”蕭祥鎬一怔，說道：“你那些地，我祖祖輩輩耕下來，花了不知多少血汗，才收拾成現在這樣子，如今我腳不好，你就要抽回去，這怎麼講得過去呢？”蕭祥鎬的母親在一邊懇求道：“你把地抽回去，我一家子老老小小怎麼過呢？”詹鵬光却吼道：“你一家餓死我也不管！田一定要抽！”說罷，就回

身跨出了房門。过后，詹鵬廷就用一根竹竿串着三张草紙往田头一插，这意思就是說，老佃戶再不能到这些土地上去了。萧祥鎬气极了，真想跟狠心的地主拚命，可是，当他从床上一坐起来，就又支撑不住倒下去了。

如果說，一个人两脚瘫痪，就象一把琴儿断了一根弦，那么，土地被地主抽回去，就象是两根弦都断了！萧祥鎬家里都快断炊了，怎么办呢？他們只好伸手向人家借貸、求乞了。可是，有錢的財主誰又肯把粮食借給他呢？梅营乡有一个高利貸商人，本來說好以一担二斗谷子同萧祥鎬換三十根杉木，但当他的老婆跑去挑谷子时，那商人却搖頭說：“不，我不要你的木头了，不合算，我把一担二斗谷子拿去放利，一二得二，二二得四，一年淨收二担四呢！”她虽然生气，但仍求情道：“那你就把一担二斗谷子借給我們吧，往后还給你二担四！”那商人冷笑道：“嘿，你男人沒有脚，包要餓死，谷子借給你，还能拿两条烂脚还給我呀？”这一句刻毒話，使她气得說不出話来。

那时，苦难的家庭重担完全落在萧祥鎬的老婆肩上。萧祥鎬内心非常感激他的老婆，然而，他却不知道，这时他年青的老婆，已經被有錢人看上了。有些狼心狗肺的媒人已經秘密地为她找好了新的婆家。一天，从十八都潘坑来了两个人，你一言我一語地对萧祥鎬的老婆說：“你男人沒有脚，有什么可以图的？你天天討飯吃，能过日子嗎？你才二十来岁，如果愿意，担保能找一个吃好穿好的人家……”萧祥鎬知道后，心如刀割。他老婆坚定地安慰他說：“你放心吧，我怎么忍心离开你們呢？”萧祥鎬哽咽着发誓道：“只要我萧祥鎬还有一口气，我还要用鋤头、柴刀做一番事业出来，不能眼睜睜的让你

們都餓死！”

千辛万苦掙活命

1936年，蕭祥鎬能够起床了，可两腿还是不能动步。他只得用两手支着两条板凳，俯着身子，靠手和上身的力，把身体和两只脚往前拖。这样移动几步，就会累出一身大汗。尽管如此，蕭祥鎬每天都坚持鍛炼，从早到晚，极少休息。一直到两眼发黑，精疲力竭。当他母亲劝他休息时，或者他自己有些灰心时，他脑海里立即就会閃过地主和高利貸商人的猙獰嘴脸。这样他就又继续頑强地鍛炼。几个月以后，渐渐习惯了，他就开始开荒种油茶。他借来了鋤头、劈刀，叫他十岁的大儿子替他扛到山上。然后，他自己支着凳子和拐杖，一步一步挨到山上去。最初，他是左手抓住凳子，支着身体，右手揮动劈刀劈草。这样虽然能劈一点，可是十分費劲，一会儿就提不起劈刀了。辛苦了半天，劈开的土地还没有一张桌子寬。后来，他自己做了一张一尺多高的长凳子，叫他儿子搬到山上，他坐在凳子上用双手劈草、鋤地，这样就快多了。但是，斜坡上凳子放不平稳，怎么办呢？他又做了一张一头有腿一头沒有腿的长凳子，沒有腿的一头靠在山斜面上，板凳就平稳了。油茶播种的时候，他又自己編了一只竹篮子，装上种子挂在腰上，移一步撒一顆。……就这样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冒着烈日、風雨、严寒，頑强地开山垦荒。冬天，他在凳子上挂着一只火籠，手冻僵了，烘一烘，又继续干。有时，一整天才鋤一小块地，开一条短短的水沟。过去只要他揮起鋤头，不用一、二个钟头就干完了，現在，要干上二、三天。他整整辛勤地劳动了十二个

月，才在住屋附近的山坡上开出了一亩半土地，播上了几百顆油茶籽，間种了二千多株番薯。一亩半地虽然很小，可是，萧祥鎬在这土地上却不知付出了多少汗水，多少血泪啊！不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，他想，最主要的是：他已經有了自己的土地，不用再向地主詹鵬廷乞求了，不用再向梅营放高利貸的人乞求了！他兴奋地想：“你們要叫我萧祥鎬餓死，看吧，我現在就干給你們看看！”第二年、第三年、第四年，他又继续在附近开垦出几亩荒山来，种上了油茶、油桐和番薯。

1940年以后，萧祥鎬开始到外村的荒山上去垦荒。这些荒山有的距离七、八里，有的十五六里。从楊梅坪到园竹山，不光要走十几里崎岖的山路，而且有一条很长很陡的山崗。萧祥鎬依然是左手拄着拐杖、右手支着一张凳子、半俯着身子一步一步往前移动。这一条路，人們只需要走一个多钟头，而他至少要花一天半時間。一天赶不到园竹山，晚上，他就把棕衣鋪在路边，倒在大树下睡觉。有时遇到大雨，也只好坐着任凭風吹雨打。这些都不算什么，而最危险的是下那陡峭的山崗。在那狹窄崎岖的山路上，要找到一个放稳凳子的地方，是多么不容易啊！一不小心，凳子翻了，他就头朝下順着石阶栽下去，跌得滿头鮮血淋淋，凳子和拐杖都拋得老远……但是，他頑强地坚持下来了。

旧世道比虎更凶

从1936年到1949年的十四年中，萧祥鎬先后和他儿子在梅仙附近的正崙、崙头、后东坑、峪竹山、园竹山、牛不肚、八都山等地栽种了油茶、油桐七千多株，杉木一千多株，开垦山

田二十多亩。他的家业，可以说是用血泪和汗水创立起来的。然而，社会制度是根本问题啊！他并不能逃出剥削阶级的魔掌，仍旧在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榨下度着悲惨的生活。

有一回，萧祥镐在高山种番薯，忽然，山头上一只大老虎吼叫着朝他的方向走来，山下许多人都吓得四处奔逃，他没法逃跑，只得握住劈刀，准备和老虎决一死战。幸亏老虎没有发现草丛里有人，回头走掉了。后来，有人对萧祥镐说：“你是老虎嘴巴里掉出来的人啊！”他苦笑着道：“我如今还在老虎嘴巴里过日子哩！”可不是吗，旧世道比老虎凶残得多了，要躲避都躲避不了呵！

最初几年，他刚刚开始垦荒，收成不多，每年不能不靠借贷过活；以后几年，虽然土地多了，林木多了，可是，由于路远、土瘦、力弱、肥少，只能轮种一部分土地，收成也不高，林木也不可能很细致地抚育管理，收入也有限，而多年积压下来的债务却比以前多得多了。每年辛辛苦苦收下的谷子、油茶都要先挑到梅仙、梅营和八都去还债，稍迟几天，债主就逼上门来。这样，吃的穿的又得另外再借。那些高利贷剥削者，又乘机抬高利息，任意敲诈剥削。有一回，萧祥镐的老婆去向一个富农借粮食。那富农最初说没有粮食借，她再三恳求以后，那富农说：“粮食是有，就是怕你嫌利息重。”她问：“多少？”富农说：“一斗还一担！”这是什么样的利息呵！可是，为了活命，不借又吃什么呢？她心里骂着这个狠心的富农，还是不得不咬着牙根借了一斗粮食。年复一年，旧债加新债，利上再滚利，高利贷把他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加上国民党官府的苛捐杂税，横征暴敛，尽管春夏秋冬，他栉风沐雨地

支着凳子，拄着手杖，拖着残废的身体，翻山越岭去耕种，到头来仍旧不得温饱。1941年天旱，几乎没有什么收成，萧祥镐辛苦一年收下的几担谷子全部挑去还债、纳税还不够，家里已经断了炊，全家老小吃草根度日子，他自己也只好吃草根在正崙山上开荒种地。一直到解放那年秋后，萧祥镐虽然苦挣扎了这么多年，虽然年年在还债，但是依然欠人家十几担谷子，债越还越多了，这样的重债，对于这个两脚瘫痪的农民，要不是解放了，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还得清呵！

党的恩情海样深

解放了，土改了，萧祥镐翻身了。人民政府照顾萧祥镐，选择了距他家较近的、较好的十三亩土地分配给他，并为他除去了一部分不合理的旧债，使他很快就偿清了十几年积压下来的债务，这才真正结束了他的悲惨的生活。萧祥镐，他怎能不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、毛主席的恩情呵！1956年，杨梅坪掀起合作化高潮的时候，萧祥镐立即将自己用血泪开垦出来的和土改分到的四十多亩土地，以及近万株油茶、油桐、杉木，入了高级社。入社后，集体生产发展了，他的两个儿子都长大结婚了，家里有了四个主要劳力，生活过得更好了。不要说家里添置了许多棉衣、毛衣、卫生衣、热水瓶、球鞋等等，三十年前他父亲没有盖完的房子也逐渐盖起来了。有人劝萧祥镐说：“你苦了一辈子，该在家里抱孙子享福啦！”可是，他没有这样做。解放前，他血泪创业十几年，仍然一身债；如今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，又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，劳动才有了真正的收获。他明白，只有在集体的力量支持下，才能创立

真正的家业，劳动人民要彻底刨掉穷根，永不让过去的苦日子再回头，就必须继续发愤劳动，发展集体生产。因此，他还是经常支着凳子、拄着手杖上山去种植和抚育油茶、生产杂粮，一直保持着热爱劳动的本色和艰苦奋斗的精神。虽然，从互助组、合作社到人民公社，集体都非常关心他，没有把他作为一个劳动力安排农活，但他还是自觉地坚持参加劳动，这是性质不同的劳动了。有一回，梅营大队党支部书记特地对他說：

“祥镐伯，你年紀大了，脚又不能走，不要上山了，你就在家里做点什么吧！”而他却笑笑說：“哎呀，过去那样的日子都苦过来了，现在这样做一点，算得什么呀！”他对集体的油茶林，尤其是他自己种植的油茶林，有着深厚的感情。虽然集体已经安排人去抚育管理了，但他还是经常要去锄锄草、松松土。有人对他說：“祥镐伯，那地会有人去锄嘛！”他說：

“嗨，誰锄还不一样，管油茶要管得細，并且不能誤季节，俗話說，七月挖金，八月挖銀呵！”集体有时要补給他工分，他也不要。据統計，解放后他在正崙、白梅、树头等地新栽的油茶、油桐就有二千多株，并在大峽山开山劈草十一亩，准备继续种油茶一千多株、間种油桐一千多株；此外，在楊梅坪大隔还开垦水田十多丘。他不但经常上山劳动，即使在家里的时候，也閑不住。他有一手編竹器的好手艺，他編制的竹器有米籬、米篩、簸箕、竹箕、竹籃、竹筐、火籠、鷄籠、番薯扁、草耙、土箕、菜盖、斗笠等三十二个品种，一年要生产二三百件。现在，楊梅坪生产队和附近一些生产队所用的竹器中，有許多就是出自他的双手的。

萧祥镐的家就在村口的路边上，人們外出劳动、赶集从这

儿经过时，总喜欢拐进他屋里坐坐，萧祥镐常常一边编竹器、一边和他们谈自己二三十年的家史。他的对阶级敌人的仇恨、热爱劳动的品质和顽强的开山精神，教育了群众，也教育了青年一代，连周围村庄的人都知道杨梅坪有一个两脚残废的开山英雄。他的精神感动、鼓舞着人们向山区进军，和大自然作斗争。目前，这个生产队除了有三十二片比较集中成片的油茶林以外，几乎家家户户都还有一些零星小片的油茶树，可以说，已经变成一个油茶之村了。

我到杨梅坪生产队时，正逢油茶开花的季节，银花遍野，满山皆白，对着这一派繁花盛景，我自然而然地把它同萧祥镐的勤奋形象联系起来。今天的萧祥镐老人满面笑容，精神矍铄。我见他那张帮助走路的凳子上满是疤痕，不禁问道：“你这扶手的凳子用了多年了吧？”他笑道：“同志，解放前十几年，我翻山越岭用坏了三十张这样的凳子哩！”三十张凳子，这包含着多少血泪，多少辛酸啊！接着，他就向我谈起了目前他家里的情况。他说：“我如今一家十四口人，大儿子和两个媳妇在队里劳动，二儿子是队里的会计，光我自己编竹器，有时一年也能收入三四百元，吃穿用是宽裕啦！没有党和毛主席，没有公社，我萧祥镐一家会有今天的日子吗？”说完，他爽朗地高声大笑了起来。是啊，一个过去倍受剥削压迫的残废老山农，如今翻身作了主人，并且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贡献着力量，他有着怎样幸福和自豪的感情呵！看，他一身都焕发着扬眉吐气的神采！

（苏田插图）

馮义江的血泪仇

阮文梗

1946年10月27日深夜，年青的庄稼汉馮义江，躺在木板床上，輾轉了一个多钟头不能入睡，今天晚上他太兴奋了。

出生以来二十五个年头，他們一家总住在祖代传下来的一间低湿又破烂的小房子里。屋頂漏雨、四壁透風，而最使他着急的，是他快成亲了，全家大大小小都挤在一间破漏房子里怎么成呢？为了再盖两间房子，他和媽媽、嫂嫂起早摸黑，不顾劳累，终于得了几年較好的收成。加上平时省吃俭用，也掙得一点节余。再求些亲友帮助，东拼西凑，今天才从城里买回了十六根木材。他越想心里越甜，直到午夜一时多才含笑睡去。

翌晨，天才蒙蒙亮，义江突然被嫂嫂王衣妹的惊叫声吵醒了：“叔叔！叔叔！快起来，木材全沒了！”义江象当头挨了一棒，一脚踢开破被跳下床来，赶快同嫂嫂分头去找。义江沿着时隐时現的足迹，一路找去，果然在一块空地上发现一堆木材，他数一数，正好也是十六根！木材上还写着“义江”的名字，那是他选购木材时杉木行給写的記号。他憋足劲，一口气抗起两根，朝着家急步跑去。刚走上几步，忽然听到一声凶暴的吆喝：“义江！敢抬孙老爷的木材！”一个头戴灰呢礼帽，

敞开天青色对襟衫的“凶神”，摇摇摆摆地走过来。天哪！这不是远洋乡大恶霸孙亨梧的狗腿孙宜兴吗？义江心中虽然气愤，也只好强作笑脸地说：“宜兴哥，这木材是我的，你看，还有我的名字……”

“胡说！你的木材怎么会放在孙老爷地上？谁不知道这是孙老爷要盖大楼的木材！”宜兴看他还不放下，逼上来就打了义江一下耳光，又踢了他一脚。义江开头和他说理，后来向他苦苦求情，但是这狗腿子毫不饶情。

“我和你拚了！”义江忽然一拳打去。宜兴翘起了一下，站稳后拔出短刀来，义江一看，转身向牛山乡拚命跑去。宜兴望着义江的背影冷笑说：“哼，穷崽子，走了和尚跑不了庙！”义江一整天在牛山乡跑来跑去，直到天大黑了，跑得又饿又



累，才慢慢走回来，当他刚走上虾板桥，猛然钻出一个人影，挡住去路叫道：“认得你爹宜兴嗎？”义江吃了一惊，掉头便跑，誰知桥头又閃出两个狗腿。狗腿二话沒說，捉住义江，狠命地踢呀，打呀。不一刻，义江被打得鮮血淋漓，昏过去了。坏蛋們还不甘心，最后还把遍体鳞伤、不省人事的义江，凶狠地踢到桥下。幸好这时河里沒水，义江才免于—死。

第二天，义江第三次苏醒过来时，看到自己的床前站着十几个乡亲，床沿上还坐着自己的老媽媽。她眼泪象断綫的珠子似地滴到义江的脸上，用手輕撫着义江的头說：“江儿，你会好起来的。我已央人向孙宜兴說情，贖回木材去了。”

“什么？跟这群狼心狗肺的說什么情？”义江气着要掙扎起来，但遍身的剧痛又使他躺下去。

突然，屋外传来九岁的姪儿馮忠仁的尖叫声，紧接着宜兴带着四个狗腿破門冲了进来：

“拆他們的房，打死他們，看还敢不敢要贖回木材？”

“真大胆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”

四个狗腿七嘴八舌地罵着，抓住老媽媽的头发，又一脚把她踢倒在門边。义江的心象刀割一样，他咬破了嘴唇，强撑起身来想和他們拚，但是他刚一起身馬上就摔倒在床下。这时，屋里的十几个乡亲，无比憤慨，一齐涌到門口，屋外又围上了十来个乡亲，把狗腿团团围住：

“有事慢慢讲，可不能打老人家！”

“不能含血噴人！不能仗势欺人！”

眼看众怒难犯，这时，孙增开露出头来，以“保长”的名义进行“調解”。宜兴他們便无理地提出賠償声名的要求，他

說：“孙亨梧老爷拔一根毫毛都比你們大腿粗！他会偷你們穷鬼的东西嗎？你們有意破坏他的名声，得賠償十三担半谷子，两桌酒，十包百子炮，限定五天之內送去。如果过期，哼，等着瞧吧！”說完狗腿們就趾高气揚地走了。

为了向恶霸求和，义江媽媽和嫂嫂，怎敢不答应这万分苛虐的要求？虽然义江一再地反对。一些乡亲想給点帮助，还不敢公开相助，只是暗地里你三十斤、他五十斤地把自己的口粮拿了出来。到了第五天下午三时多，才凑齐了十二担六十五斤谷子和六十斤大米（因为谷子不够，还差八十五斤，只好用六十斤白米折頂），連同两桌酒菜，分成十三担，大放着百子炮送到恶霸家去。

“宜兴来了！宜兴来了！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小忠仁因为那天被狗腿吓出病来了，在昏迷中还发出尖叫声。婆媳俩惊慌地奔向床前，媳妇伸出手，輕輕地按着床上奄奄一息的小儿子前額。“烧得很，两天水、米不沾唇了，我看，請个医生来看看……”

“請医生，缸底都挖空了，哪来的錢？”

当晚七时多，小忠仁因为得了急症，沒錢就医，大家眼睁睁地看他死去。

义江一家被恶霸害得这样凄惨，可是孙亨梧一刻也沒放过他。

过了两年，一个很迟的夜晚，义江那低矮而又破烂的房屋里，油灯还亮着。床上坐着十几个人。他們都低着头，紧鎖着双眉。好一会儿，孙利旺才抬起头来望着义江激动地說：“义江哥，家乡固然舍不得离开，但他們已放出風声要逼死你，你

怎能在这里呆下去？”

“是啊！两年来恶霸三次割走了你家的稻；今天狗腿在你的田里又撒了那么多的瓦礫和碎玻璃，这明明是不叫人活下去啊……”

“我們去告他們，可能还有一天会……”他話未合口，亨貴伯气憤憤地捶了一下桌子，說：“要告？真不懂世道！阮世利一家人从大前年告到今年，从地方法院告到最高法院，有什么結果呢？”亨貴伯稍停了一下，又朝着义江說了下去，“賠錢負債遭报复，九条命的不白之冤石沉大海！你想告他們，你有多少錢可花？你有多少条命？我看，火烧脚跟，还是先跑再讲！”

这时，久久不說話的嫂嫂擦着眼泪对着叔叔說：“我們走了，留下的田地給誰种呢？”

“田地！”义江捏紧拳头下狠心說：“我想卖掉两亩一还債，余下的一亩二先让乡亲们种几年再說。有一天，我們总要回来的！”

义江全家人避到福州牛山才六天，同乡徐梨梨就找他来了：“义江哥，你的地我实在不敢种，那二亩一田誰也不敢买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走后，恶霸指使狗腿在你的地里插上‘孙界’的牌子，并对大伙儿說，誰敢种义江的地，就割誰的稻，誰敢买义江的地，就烧誰的房子！”

“这这，这真是沒有天理……”义江一时气得說不上話。

梨梨說的是真話，义江那三亩三的地，問遍了本村和邻村

的人，誰也不敢种，誰也不敢买！为了还債，义江被逼得沒有路走，只好忍心把祖传三代的、仅有的三亩三田地，以极低的价錢卖給了恶霸孙亨梧。

1949年，福州解放了。馮义江一家人都回到了远洋乡。他們跟远洋乡許多农民兄弟一道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斗倒了地主恶霸孙亨梧。現在，他們的新房子修建起来了，义江不但結了婚，还成了几个孩子的爸爸了！他嫂嫂的孩子馮忠貴，入了党，現在鐵路局当上了工会主席。在这幸福的日子，工余飯后，义江总爱和他的孩子們談起过去的痛苦生活。每次一談起来，他們一家人莫不流泪咬牙，互相叮嘱着：“永远都不能忘記！”

(黃迪杞插图)

抽水机旁話恩仇

李 行

平和山格公社宝丰大队，是个出产粮食、蔗糖的富庶地区。1963年全大队两千四百多亩稻田，都在“清明”前后插下了秧。在此以前所种的甘蔗、花生、烟苗，也长得欣欣向荣，要不是赤日当空，光看田野里的一片秀丽景色，誰能相信这是連續两百天无雨的大旱年呵！

是甚么力量使宝丰大队旱年不旱、各种农作物照样适时播种和正常成长呢？社員們异口同声地说：是新建的抽水机站給我們下了“及时雨”。新建的抽水机站，它給宝丰大队的社員們带来了莫大的欢欣鼓舞，也使年老的一輩引起了多少辛酸的回忆。

假“水龙”的騙局

距今三十五年前的“民国”十七年，宝丰碰上一次干旱。当时充当宝丰乡伪乡长和伪保长的两个恶霸地主陈礼成、陈活流，利用旱灾强迫农民出錢去买“水龙”来抽水。他們按每人摊派四十八斤谷子，按糖坊每榨一天蔗勒索三十二斤紅糖，全乡农民共被敲詐勒索去十三万斤粮食和四万三千多斤紅糖。陈

礼成、陈活流这两个恶霸地主到漳州去买来“水龙”了，宝丰乡的农民争先恐后地去看一下，甚么“水龙”也没有，只看到两根四吋口径的铁管，直通通的象两根大竹筒一样躺在地上，谁知道他们买它是干什么用的？

“水龙”的骗局就这样结束了，干旱的威胁还是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，宝丰的农民成天引首翘望万里无云的长空，活命的雨水连一星一点也盼望不到。可是恶霸地主陈礼成、陈活流两家在村头新盖的两座红砖三层楼，却一天比一天添高。原来这就是恶霸地主乘灾打劫、制造“水龙”骗局的目的。

农民的血泪 地主的大厦

你说，当时的农民真是那样容易上当吗？不，世代受尽地主压迫剥削的穷苦农民，那一个看不透地主的黑心肝，谁还相信地主会给农民办件有益的事情！但在那时，陈礼成、陈活流既



是地主，又是恶霸，还是国民党反动派的“乡长”、“保长”，真是有錢有勢，閻罗王都要讓他們三分。所以当他們派粮派糖說要买“水龙”的时候，有些农民明知是騙局，但怕恶霸地主的迫害，不得不忍痛把粮食和糖交給他們；許多交不起派粮派糖的貧苦农民，受尽了吊打压榨，有的还被害得卖田卖子，傾家蕩产。貧农陈乞食，就是被迫害得家破人亡的。

三十五年前，陈乞食一家八口过着十分穷苦的生活。恶霸地主陈礼成、陈活流却不管他家里“吃了早頓沒晚頓”的困难，同样摊派他三百八十四斤粮食和一百五十斤紅糖的“水龙”費。陈乞食受不了这么一笔沉重的負担，便跑到陈礼成家里去“求情”，誰知未入地主的門，在門口就被地主爪牙拦着毒打了一頓。当陈乞食拖着伤痕斑斑的身子回家时，伪保长陈活流早已把他的大儿子陈龟抓走了，几个伪保丁还把他家盖水缸的木板拿出来釘門封厝，陈乞食看到这种强盜行为，上前責問他們“讲不讲天理。”結果又被伪保丁用枪把打得當場吐血。以后还是四邻看不下去，出面担保緩交一日，伪保丁才扔下封門的木板走了。第二天大家东借西挪，凑了三百八十斤谷子挑給陈礼成。恶霸地主陈礼成称了以后，說声“还差四斤”，伪保长陈活流立即指派伪保丁，再次冲进陈乞食家里搜查，翻缸倒甕把他家里仅存的两升白米倒去，抵交了“尾欠”。

陈礼成、陈活流从貧农陈乞食身上压榨了三百八十四斤谷子后，把陈乞食大儿子陈龟从私牢中放了出來，他們警告他說：你家还有一百五十斤紅糖未交，回去要赶快想办法交清，要不，就抓你弟弟当壮丁，迫得陈乞食的第二个儿子陈湖連忙逃到南靖县去，以后在另一个地主家当雇工，劳累身亡。恶霸

地主陈礼成、陈活流听说陈湖逃走了，就把陈乞食的第三个儿子陈解抓去了，要他当三年长工，抵交一百五十斤红糖的“水龙”费。害得陈乞食家不象家，他又气又恨，一病不起，躺到第二年七月就死去了，不久，他的妻子也悲愤而死。正当贫农陈乞食夫妻相继死去的时候，地主陈礼成、陈活流盗用“水龙”费建起的两座三层红砖大楼落成了。同一天里，村这边是贫农陈龟父母被迫害得相继含冤而死，举家哭得震天撼地，最后连棺材也买不起，只得用破席卷尸，草草收埋；而村那头恶霸地主却正在举行庆祝大厦落成宴会，乡绅地主在举杯欢庆。真是一边穷人在恸哭，一边地主在狞笑；一边穷人在忍饥挨饿，一边地主在荒淫作乐。

老贫农机旁教子别忘本

解放后，骑在宝丰农民头上的恶霸地主兼伪乡长、伪保长陈礼成、陈活流被打倒了，广大贫苦农民翻身作主了。他们在党的领导下，沿着集体化的道路，组织起来发展生产，依靠集体经济的发展，逐步积累扩大生产的资金。今年，宝丰大队在国家的帮助和工业部门的支援下，建立起农民自己的真“水龙”——抽水机站。它座落在河边，在一所方石基、红砖墙新房子里，安装了一台三十匹马力的柴油机，带动两台八吋口径的抽水机，全大队二千四百三十多亩稻田，有一千九百多亩可以直接引水灌溉。当这座抽水机站开始抽水的一天，宝丰的农民象办喜事一样拥到抽水机站或渠道两旁，和哗哗的流水一道欢呼歌唱！老贫农陈埭这一天特地赶到抽水机站，来看负责管理柴油机的儿子陈振声。他参观了抽水机站的里里外外，满怀激

情地对儿子說：你两岁的时候，我們宝丰也鬧过买“水龙”的事，那是恶霸地主陈礼成和陈活流的鬼花样，他們假买“水龙”摊粮派糖，全宝丰五百多戶农民，为交“水龙”費被抓去吊打、关禁、抄家、封門，被迫卖田、卖子的，就有两百多戶，我也为交不起“水龙”費，前后被地主抓去关了三次，每抓一次就被敲詐一次，我們家給地主敲詐得傾家蕩产。現在，共产党、人民政府幫助我們建起抽水机站，我們貧农管起真“水龙”来了，你可不能忘記我們老一輩为“水龙”受的苦难，今后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呀……。老貧农机旁教子的一席話，使當場許多年青人受了一次深刻的階級教育，也进一步鼓舞了人們力爭丰收的斗志。

(谷 水插图)

敌 我 无 亲

辛 炼

1917年前后，天花、霍乱、鼠疫相继袭击了莆田县东坡村。贫农陈庆云的妻子死了，他的两个兄弟：陈阿景一家四口，陈阿目一家三口，相继死光。在那灾难的日子里，陈庆云不停地奔走里外，悲痛得几乎把眼泪都流干了。料理完三家八口的丧事，虽然负下了不少债，但也接过两家微薄的业产。三家合一家，陈庆云一共有了田园四亩五分，荔校园八分，房子三间。

死去的亲人刚刚入土，陈庆云的泪痕未干，作为叔伯兄弟的地主陈光亮不仅不对庆云表示一点同情，却对着他的一点产业垂涎起来。

“唔，有油水了！……”陈光亮心想：“对，骗他来合伙做生意。”

东坡村是个甘蔗之乡，这一年甘蔗收成时，陈光亮来找陈庆云，甜言蜜语地说：“你如今有田有果，有些本了，我叔伯兄弟合伙买蔗榨糖，虽说不能一本万利，赚个对半准跑不了。”

陈庆云哪知是計，只是心中盤算道：“买蔗榨糖，我凭力气赚些工力錢，能还清債，日子过好些，就感謝天地了。”于是便答应了下来。

陈庆云把那一年卖果所得的一批錢投了本，不够的由陈光亮垫。陈庆云出力榨糖，陈光亮卖糖。这时候，牙人出身的陈光亮，就熟练地耍起了“前后手”的花招：糖运到涵江鎮，要是糖价行情看落，他便搶个好价卖了；却把落到最低的价格繳賬。要是行情看涨，他就把糖放着等，等到涨得差不多了才出賣，却按起先的低价繳賬。这样的生意做了三个月，陈光亮赚了大把的錢，而合伙做的“生意”却一再亏本。目不識丁的陈庆云不知道受了騙，有些惊慌了，到最后一批糖出手时，便特意去打听了行情：糖价大涨。这时他好不欢喜。正想立即卖糖，可是狡猾的陈光亮又耍出了新花招說：“福州糖价更高哩！前几批运气不好，这批要运去福州大赚一把，就收盤。”陈庆云信了他的鬼話。等到陈光亮从福州卖完糖回来，竟又对陈庆云两手一摊說：“倒霉倒霉，一到福州糖价就跌了！大亏本！”亏本的錢二一添作五分摊，陈庆云除了把投进的本錢賠光了不算，还欠下了陈光亮三百多块大洋。这时，陈庆云才发现自己上了大当，但已悔之不及了。爭不过，只好悲叹自己命苦！

欠賬要还！陈光亮再不是当初合伙做“生意”时的那副亲热劲了，馬上把脸一翻，立逼还債。陈庆云一时那里能拿得出三百多块大洋，陈光亮眼里閃着凶光說：

“还不起，月息二成照算！”

本迭利，利迭本，三百多块大洋夜以继日地滾涨着，一个

月、二个月……一年。陈光亮看看差不多了，便带着爪牙上陈庆云家，一进门，就是雷轰样的一声喊：

“钱来！”

“钱钱钱……”陈庆云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了。

“没有钱！”陈光亮接过嘴，“我替你算好啦，把你的田、园、厝一应物件都抵上吧！还差着些钱尾以后再说。”

“那那那我一家人吃什么呢？”一向软弱的陈庆云求情道：“你不看我叔伯兄弟面上，也得看姪儿幼小，……”

“咳！亲不亲，欠债算清么。”陈光亮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什么你老他幼的，我管不了！”

陈光亮一声令下，爪牙们便硬拉着陈庆云在事先写好的卖契上画了押。这一天，贫农陈庆云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，用竹篮挑着几副碗筷和一些破衣衫，被赶了出门。就这样，四亩五分田园，八分荔科技园，三间房子，二口粪池，一架木床，六个大缸小缸……统统被陈光亮夺了去。吃人的地主，对自己的亲人就是这般落井下石的。

二

陈庆云一家被赶出门后，在村边一间破屋里棲身，在贫病饥寒交迫中，次子死了，童养媳死了，陈庆云也死了。接过仇恨的火把的，是全家独存的陈庆云的长子陈元森。

当时才十二岁的陈元森被迫流落他乡，以求乞和做杂工度日子，十年后才回到村里。那时——1930年，陈元森已是个壮实的年青人了。初生之犊不怕虎，他回乡不久，就闖进陈光亮家大楼，想讨回园厝，可是，话才出口，陈光亮便喊人把他赶

出門來。陳元森氣不過，回過頭對陳光亮吼道：“你記着，這筆賬总有一天是要算清的！”這時陳光亮只報以一陣輕蔑的狂笑。

不久，陳光亮的長子陳樹賓被以陳杰為首的一伙強盜綁架，敲去了一筆錢。陳光亮却是軟土好掘，對陳元森起了毒心：“哼！這定是陳元森做的鬼，斬草要除根。”一天傍晚，陳元森突然被一伙人抓進了陳家大樓。

這天夜里，村里老人阿木上廁所，聽見路旁有“噯喲、噯喲……”的呼痛聲，走近一看，原來是陳元森。“元森怎麼樣？”“我的兩顆眼珠叫陳光亮挖掉了呀！”阿木听了趕快上前扶起他，在黑暗中看不清臉，摸一摸濕糊糊的沾了一手血；老人怒不可遏，不絕口地大聲罵道：“把姪兒的兩眼都挖掉呀，賊光亮，虎狼心肝，虎狼心肝！……”這憤怒的聲音驚動了左鄰右舍。人們圍上來拿燈一照，只見陳元森兩個深陷的眼窩內血還在流。陳元森忍着痛，向大家控訴陳光亮的暴行：

“……我突然給陳光亮的人抓進去，用東西塞住了嘴，朝天緊緊綁在板凳上，陳光亮象個惡鬼，一手拿錘子一手拿竹筒，嘴里罵道：‘好大胆，想討產業，一刀砍死便宜了你！叫你先留下雙眼在我家看守你的產業！’接着就壓出我的雙眼，又用鐵鉤伸進眼窩里亂挖，痛得我昏過去……以後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。”人們听着，有的咬破嘴唇，有的握拳擊牆，無不憤恨萬分。

消息傳開，全村人怒火騰騰，有的人說要告狀，有的人說告狀沒有用，縣黨部書記、參議長都是陳光亮的靠山；有的人便提議要跟他拚一場……反抗的怒潮在猛漲着，翻滾着。陳光

亮眼見势头不对，才吐出一亩田給陈元森，說是贖贖。但是，血海深仇，一亩田怎能填得了？！

三

被地主挖去双眼的陈元森，在黑暗的日子里掙扎着。穷朋友天天上門跟他談心，劝他不要过份苦痛；穷苦的女人楊福治情愿跟他一起过活，耕种那亩仇恨田。許久后，有人偷偷对他說：“听說共产党快来了，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。”啊！漆黑之夜透来一絲亮光，陈元森坚强地活了下来。

言不虛传，1949年共产党来了。1950年，在土改中召开了斗争地主兼恶霸陈光亮的大会。和許多被害死人命和被夺去财产的农民一样，陈元森也上台訴苦，斗争陈光亮。他吐着吐不完的苦水，由哭訴而怒吼。斗争会上群情激昂，人人恨不得把陈光亮食肉寝皮。斗争大会后，根据群众意見，人民政府判处恶霸陈光亮死刑。陈光亮一听，吓得丢魂失魄。这个平日作威作福的衣冠禽兽，脸面呀，輩份呀，全忘了，双膝“碰通”一声跪下地，磕头如舂米，合掌狂拜，乱喊乱叫：“叔公 孀婆呀！阿叔阿孀呀！阿兄阿嫂呀！你們可怜可怜我，就当我一头畜牲，一头狗，让我再活几年……。”回答他的是“打倒地主恶霸！”“枪决陈光亮！”的巨雷般的口号声。

陈光亮絕望了，象肉团一样瘫了下去。但是，当他瞥見陈元森坐在台上时，象落水狗抓着一根草絲，跪行到跟前哀求道：“元森，我就是多么坏，你我还是叔姪，你替我說句好話吧！”

“啊！你认得你我是叔姪嗎？”

“是是是，你我就是有千冤万仇，終归还是亲人。”

“你我还是亲人嗎？你靠过来，我要认一认你！”

陈光亮赶紧凑过去，陈元森伸手揪住他的胸襟，狠狠地打他一顿耳光，喘着气发問道：“你认得你我是叔姪，当年是誰夺去我家产业？你认得你我是叔姪，当年是誰逼死我一家人？你认得你我是叔姪，当年是誰挖去我的双眼？……你的心，是狼心！是虎心！我要认一认！”陈元森伸手去摸了摸陈光亮的身子，咬着牙又說：“你为什么会胖得象肥猪？我为什么会瘦得皮包骨？你我还能够是亲人嗎？不！你我是仇人！冤仇一万世也算不清！”說着，狠狠一推。

罪大恶极的陈光亮，終于得到了应有的懲处。有了共产



党，有了人民政府，除去了鱼肉穷人的恶霸地主，东坡村天明了，陈元森的心中也就亮堂了……

(成贤插图)

孤 儿 泪

——清流农械厂技术员李捷的童年

清流县农械厂，有一个技术员，姓李名捷，乳名叫做大水。今年二十八岁，是南安人。1960年，他响应祖国的号召，到山区来参加建设。他在苦瓜地里长大，是有过一段辛酸的历史的。

爹说他命不好

1936年6月的一天，乌云翻滚，台风怒吼，象一匹又饥又渴的猛兽，兇狠狠地到处乱窜，仿佛要吹毁山林、田园，吹毁大地上的一切。风，呼啸着，雨，倾泻着。南安县蓉溪村这块三角洲，眼看成了一片汪洋大海。人们对着黄澄澄的洪水发楞、忧愁、叹息、诅咒。在国民党统治的年月里，穷人有什么办法抗拒天灾呢？夜幕垂下，风雨更加兇猛，洪水从田野漫来，低处的房屋被淹了。村里的农民呼天喊地，扶老携幼，逃往高处避难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李成怨的妻子一阵阵腹痛，快要分娩了。李成怨这个穷苦的农民，上有年迈的母亲，下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十七岁、一个三岁。这时，一家人逃命都来不及了，怎么还能顾及婴儿出生呢？一忽儿，婴儿落地哇哇叫，李

成怨叹着气不知如何是好。还是“穷帮穷”穷乡亲帮助成怨把妻子和婴儿送到了安全的地方。

洪水連漲三天三夜，不时可以听到房屋的倒塌声和乡亲们
的哭叫声。……

風停了，雨止了，水退了，庄稼也全毀了。残屋断垣，满目悽涼。多少人家断炊了，多少人家奔走借粮，多少人家卖儿卖女，多少人家离乡逃荒。成怨一家也无米揭鍋，相对哭泣。成怨啊，脸色灰黃，泪水往肚里咽，只好以高利向有錢人家借了一点喂猪的糙粮来填填肚子。

成怨对妻子說：“这样大水，蓉溪少見，孩子出世不迟不早在这个时候，唉！命不好哩。取个名字叫大水吧！”

父兄逃往馬來亞

成怨的話对嗎？錯啦！不是孩子的命不好，是反动政府和地主阶级的統治压迫造成了人民的悲惨遭遇。这些肥头大脑的家伙，平日不会給农民修水利，水灾后也不会給农民賑济，恰恰相反，他們就在这个时候加紧了敲榨勒索。蓉溪的地头蛇很多，上有伪区联公所主任李凤翔、伪乡长李泰宣，下有伪保长李剑明、伪甲长李成果和狗腿子李正。洪水来时，他們花天酒地，高枕无忧；洪水过去，他們一看田里、庄上、山間，也着了慌。他們着慌的当然不是农民生活无着。而是生怕在灾荒日子里从穷人身上榨不出更多的油水。他們不約而同地向农民狠开了刀，挨家挨戶，催稅逼款，不是罵人，就是打人。村里很多农民沒法活下去逃到海外去了。成怨沒日沒夜地劳动，还养不了家里几个人，已經是度日如年，那里还經得起这个逼

稅、那个逼捐呢；然而，李凤翔这些人并没有放过他。没有办法，成怨只好忍痛将祖辈留下的几亩水田卖掉，钱，全数拿去交稅。可是，就是全都拿去交稅也还是不够。伪保长李剑明說，如果不交清稅款，就要将他送到区联公所去坐牢。想想看，要是成怨被送去坐牢，这一家大小怎么过日子呢？在这个时候，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門啊！母亲和妻子見他成日愁眉不展，坐臥不安，也忧心忡忡。怎么办呢？一家商量，只好卖孩子。卖哪个？卖大水吧，人家都說，这个年头，自己的日子都难过，哪来錢养这个“垫錢貨”。大水不值錢，要值錢就要卖大儿子，可是大儿子过一两年就是一个强劳力，家里一个好帮手。但眼下沒有錢就难过关啊！結果，成怨夫妻只好狠狠心，把第二个儿子卖掉，去交清这笔稅款。

伪乡长李泰宣心里想：“卖掉二儿子，还有大儿子，李成怨身上还有油水，我不能放过他。”他把狗腿子李正找来，要李正想条毒計。第二天，李正气势汹汹地到成怨家里，对成怨說：“你的大儿子是壮丁啦，你要把他送给‘党国’！”开始成怨懵了，后来慌了，連忙說：“他虛岁只有十七岁，还没有到龄哩！”李正翻起白眼，大声喝道：“胡說，十七岁就是壮丁了！”成怨辯駁道：“不是規定十八岁么？”李正哼了一声，說：“規定不是死的。”成怨周身发抖，說：“求求你，做做好事！我刚卖了一个，現在只有这个大孩子了！”李正爱理不理地說：“怕抽了，就得买了。我沒时间跟你消磨，五天之内，你把人送到乡公所来！”說罢便大搖大摆地走了。

成怨为了救孩子，东借西貸，湊足一批壮丁錢，交給李正。过几天，有人告訴成怨，壮丁在半路上跑掉了，伪乡公所

一两天内就要来抓他的大儿子。有人劝他再买一个壮丁去顶替，可是哪来的钱呢？他心一横，说：“逃吧！”就这样，他带着大儿子悄悄地离开了故乡，逃亡到马来亚，当黄包车夫。这以后，大水和他的祖母一老一幼的生活，就只好全靠母亲黄姜娟来维持了。

流不尽的血泪

黄姜娟是个瘦弱的女人，在家里做做家务还可以，上山下田却怎么行呢？为了三条命活下去，不行也得行，她咬着牙根到田里、到山上去做活。婆婆老弱多病，不会带孩子。黄姜娟还要把大水背着去做活，有时把他放在田边或树阴下。有一次黄姜娟在打井水，忽然两眼发黑，跌到水井里。人们把她捞起，抢救了三个小时才活过来。一个妇人家，拼死拼活地做活，一天三顿还吃不上两顿，只好吃番薯的叶子和渣子充饥。

李正欺侮黄姜娟是个妇女，常常挎着匣子枪，带着几个伪乡丁，闖进门来，翻箱倒箢，见什么就抢什么，甚至连一床破被絮也被卷走了。黄姜娟哭求留情，上前去拦阻抢劫，却遭到狗腿子一阵枪柄的毒打。她就这样被打得一连几天不能起床。

大水七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发高烧。黄姜娟正犯愁着交税的事，生怕李正来催缴，如今孩子又病了，没有钱请医买药，想起自己身世的悲苦，不禁暗自垂泪。哭了一回，起身到邻居家，要邻居帮助她把门反锁，她进屋里看护大水。一会儿，果然李正带着几个伪兵来了，他看见门上的锁，暴跳如雷，叫伪兵破门进去。李正一到屋里，看见黄姜娟和大水，发出一阵恐怖的冷笑，说：“妈的！你这个臭婆娘，竟敢耍起老子来了！”



啪，啪，一連打了黃姜娟几个耳光。黃姜娟哭，儿子也哭。李正叫伪兵把黃姜娟捆了起来，要带到伪乡公所去，細細拷打。乡亲们听到哭吵声，紛紛走来求情。

李正看見人多

而且有人滿面怒容，心里也有几分畏惧，便順水推舟，卖了个人情，走了。

伪甲长李成果是大水的堂叔。这家伙看見堂哥成怨不在家，在大水十一岁那年的一个晚上，强奸了黃姜娟。在封建社会里，妇女被損害、被污辱是不敢控訴的，这不仅因为反动政府是統治階級的，而且封建道德逼使妇女不敢讲出口。黃姜娟躲在暗角里，为了这事不知流了多少泪水。李成果以为黃姜娟軟弱可欺，更加残害黃姜娟。她怀孕了……

禍不单行，成怨的大儿子，因参加馬來亞人民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活动，被日本鬼子杀害了。成怨过份悲伤，气疯了，大街小巷找儿子，喊：“斯常！你在哪——儿？爸等——你——啦！”不久，也寂然地餓死在馬路上了。

消息传来，黄姜娟痛断肝肠。她眼睁睁地看着一家的惨象：卖的卖了，死的死了，剩下的不是年幼就是年老；原指望成怨父子能够回家，如今，这个希望也幻灭了；而自己，被糟蹋成这个样子。……她悲痛到极点，终于服毒自杀了。

到这地步，大水得靠祖母抚养啦！一幼靠一老，真是落水扶枯叶，有什么指望呢？他的祖母七十多岁了，平时多病，全靠黄姜娟孝敬和照顾，如今听到儿、孙噩耗，又眼看媳妇寻了短见，雪上加霜，悲愁交集，在一气之下她竟成了哑吧，疯疯癫癫，病在床上，无人照顾。不久，也惨死了。死后，连一副棺材也没有。一个勤劳、善良的农民家庭，就这样被反动制度吃掉了。

大水，这个无依无靠的孩子，怎么办呢？李成果把他家的房屋、家具都吞没了，把大水当作一个“小长工”。大水每天很早就得起床做活，一直要做到星星出。李成果又不给他吃饱，稍不如意，不是打就是骂。不论寒暑，大水只有两件破衣衫。每到冬天，成果叫大水到离村十五华里的高山去砍柴。天寒、路远、饥饿，即使砍得一担满满的柴，也没力气挑呀；而砍少了，就得挨李成果的鞭子。大水想起李成果的鞭子，不知道在暗地里哭了多少回。他被折磨得皮包骨头，不成个人样。村里的地主、富农、流氓、土棍，甚至李剑明的孩子，都可以随便骂他、打他。有一次，有人诬说大水偷甘蔗，把他打得遍体鳞伤，红一块、紫一块。孤儿的这一切苦难，都是血泪斑斑、仇恨难忘啊！

象大水这样的孤儿，如果不是党来拯救，难道还会逃脱他祖母、父母、兄长一样的命运吗？当然，他是没法摆脱活活被

折磨而死的命运的。但是，解放了，共产党救了他。他跳出了火坑。党和政府分给他土地，送他上学念书，一直培养到福州农业机械学校毕业，参加了革命工作。这种父母都不能给的恩情，怎么能叫大水忘怀！所以，他立志要把青春和毕生的精力献给祖国。

(三明报整理 苏田插图)